

全球化下的 中国与日本

——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東瀛末索

松本重治 題

编辑委员会成员：

聂莉莉	东京女子大学 教授雪
村田 雄二郎	东京大学 副教授雪
李廷江	中英大学 教授雪
杜 进	拓殖大学 教授雪
刘岸伟	东京工业大学 副教授雪
王云海	穴桥大学 副教授雪
小出 泉	日本国际文化会馆 企画部长雪
李晓东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代表雪

事务局成员：

李晓东	
石塚 春菜	日本国际文化会馆 企画部雪
赵力伟	东京大学 博士课程雪

前摇言

李晓东

本书的前身是留日学界的学术研究组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会刊《东瀛求索》，迄今已刊行了 50 期。在这十多年中，会刊被批准为“国际标准逐次刊行物”，作为正式的学术刊物使用日文和中文两种语言刊登会员和有关学者的论文，在日本的留学界已具相当的影响。尽管如此，为了使杂志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经过研究会的多方讨论，决定从新的一期起，以论文集的方式在国内出版。

回首百年前的中国，也曾有过一次空前的留日热潮，大批中国学子为寻求富强之路东渡日本，他们以日本为窗口在热心地吸收西方近代的新思想、新知识的同时，创办了各种杂志向国人介绍“西学”，并从各种角度探讨和宣传强国富民的主张。《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还有《民报》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留学生杂志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主力之一，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

时隔百年，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留日潮在其规模上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经过 100 年的积累，在日中国人中已形成了一支不小的专业队伍。这 100 年来仅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就已超过了 1000 人，而在日本的大学、研究所等教育研

究机关工作的在日中国人也已达 ~~接近~~ 逾千人。但是，尽管中日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加深，归国的留学人员也日渐增多，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日本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广泛地为国内所知，至少可以说，与上述的在日学者的规模不相称。这也正是我们决定用中文在国内出版这本论文集的原因，一年一本的论文集虽然力量菲薄，但积少成多，希望这项事业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能越办越好，促进国内学术界对日本学术研究的了解，扩大两国学术交流的基础。

在日的研究成果没有充分地介绍到国内并不意味着在日的中国学者对此项事业漠不关心，在外求学不仅要应付繁重的学习研究任务，还要为生活上的保障而奔波，这是海外学子的共同体验。但是，即使如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在 ~~1982~~ 1980年由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留学生们创立以来，由默默无闻的小团体成长为留日学界最具影响的学术组织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留学生和学者们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不能忘记的是，研究会的成长是与日本友人的帮助分不开的。从和中协会、国际文化会馆始终一贯地在财力和人力上的大力援助，到日本学者对当初缺乏经验的研究会的指导和帮助，没有他们，就没有研究会的今天。

当今的世界潮流已远非百年前弱肉强食横行的时代，我们不用像昔日肩负救亡图存的留日学子一样受强烈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所束缚，在多元、共生等价值日益得到人们重视的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愿作为连接中日、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这本论文集是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1987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东京举办了第十四届年度大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与在日的学者一道，围绕着“全球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主题从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等角度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进入 21 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对中国来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年。中国申奥的成功并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中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发展，经济上的发展同时使人们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借用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话说，就是“仿如一身经二世”，它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申奥的成功和加入世贸组织就象征着中国通过改革和开放向世界敞开大门并得到了世界认知的结果。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年“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似乎预言着中国更广泛的改革的开始。

随着中国更进一步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世界在预测今后中国对世界的巨大影响的同时，愈发关心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本身不仅要思考如何继续发展，还要将自己放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大潮中，以全球的眼光思考中国将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进行自我定位。同时，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要重视与我们的近邻，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并没有缩短心理、精神上的距离，只有在两个文明间实现真诚的对话，才有可能在中日之间架起一座相互理解和信赖的桥梁。

本次研讨会就是围绕以上问题意识进行的。本书所收的 15 篇论文，半数以上都来自于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特别演讲和报告。其余的也是来自具有相同问题意识的本研究会会员的投稿和有关学者的热情赐稿。研讨会特邀沟口雄三、杜维明、樊纲三位先生作特别演讲，他们的精彩讲演同时也为大会定下了基调。

沟口雄三先生在演讲中针对包含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冲击”提出了“中国的冲击”。它不同于“中国威胁论”。事实上，“中国威胁论”立足于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优越感之

上，这种优越感是近代日本在“西方的冲击”下强盛起来后形成的。沟口先生对此针锋相对地提出的“中国的冲击”，旨在提醒人们摒弃以现代化的先后划分优劣的历史观，以多元的历史观真诚地对应“中国的冲击”（演讲中文稿刊登在《读书》杂志上）。在本书的文章中，沟口先生具体地就历史认识问题指出对造成“加害”与“受害”意识之间落差的根源进行历史性洞察的重要性。他指出明治以来形成的对中国、朝鲜的蔑视感情歪曲并阻碍了日本人对亚洲现实的认识能力，当今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们的历史观是对这种蔑视感情的再生产。沟口先生把对这种意识的清算作为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沟口先生的坦诚，我们不禁要自问作为中国人应该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此，杜维明先生的演讲作了很深刻的回应。杜先生首先以高屋建瓴的视野从中国哲学思想的角度剖析了西化、现代化和全球化之间的联系与不同，同时指出全球化还加强了认同意识，加深了根源性的复杂性。他指出，¹⁹世纪中国的崛起不应成为所谓现代先进国家的威胁，中国虽然有百余年的屈辱史，但不应该让狭隘的报复心理或者“夺权”的心态主导。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才是一种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健康心态。

平野健一郎先生在特别寄稿中对全球化的讨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富有启发性。平野先生首先对现在日本关于全球化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和批判。他提出“社会、文化演变”的概念，认为亚洲各国并不仅是被动地接受全球化，各国的文化和社会同时还“反作用”于全球化，在对抗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社会、文化演变”。这从广义上来说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种演变是一种文化的“触变”，它在维持各地固有文化的同时，对文化进行了再创造，在世界范围来看，其结果是维持了文化的多样性。应该说，平野先生与杜维明先生的关于全球化的

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樊纲先生的演讲则探讨了中日经济关系和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共同发展的问題。他在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强势和弱势的同时，指出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是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所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中日双方而言应当是双赢的关系。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樊先生令人信服地提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你赢我输”、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应该放弃并以共同发展代之。

以上的演讲和论文为这本论文集定下了基调，其余的论文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基调进行的具体研究，也是在各自领域中的力作。希望这本海内外学者的成果能给读者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历史认识问题是什么问题

沟口雄三

—

回首这远年的“日中知的共同体”运动，对“共同”来说，或者说由于“共同”而显现出来的最大障碍，就是彼此不同的背景，以及对这种不同有多少自觉认识的问题。我们在第一次会议时，一致同意以只代表个人而不代表所在国家作为对话的前提，但是，不同国家所固有的不同背景，即各自国家中固有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不同环境的脉络和对其应有的注意却因此被抛开或者隐蔽掉了。

在“共同”以为会轻易地“超越国境”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问题像发出警告一样，突然从地下喷发而出，每每使会议陷入混乱或被迫中断。

在考察历史认识问题时，我最慎重的就是背景不同的问题。

历史认识被作为问题提起时，在日本包含着如何认识殖民地统治、侵略战争责任的意思。然而，在日韩中三国的人们看待历史认识问题时，这个问题所处的背景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围绕着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责任，中韩的反日或者说厌日情绪几乎达成了全民的一致，但中韩两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温度差，以

员

及日本在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责任上的国民感情的分裂状况，都暗示了这个问题在三个国家中的不同背景。

从各个国家的不同背景来看，首先在日本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眼里，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等历史认识问题，与战争问题、安保问题、基地问题、宪法问题、天皇制问题等决定日本未来方向的重要问题都有直接的关系。批判性知识分子们认识到，这不单纯是日本自身问题，它还是涉及日本所处的东亚的近邻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问题，因而也是日本知识分子应负起的重大课题。而与此相对的极端的日本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他们从相反的立场出发，同样也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是他们应该肩负的任务而进行活动。与日本国内的这种分裂状况形成对照的是，在韩国，对于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来说，日韩或者说东亚的历史认识问题是关系到自身的自我认同的核心问题。

而在中国，这又是个带有多大比重的问題呢？上一次“知的共同体”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中方与会者（指在中国的背景中思考的人士）提出了他们的重要课题，即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坦白地说，从事人文社会或者是媒体研究的日方与会者开始觉得有些意外，但经过两天的谈论，才发觉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涵盖地球贫富差距、人口过剩、经济难民等问题，以及亚洲的现代化、日中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圈对抗关系的问题。对于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来说，上述问题没有一个是可容忽视的全球性问题。中方与会者通过中国内部的问题，即通过他们自身的背景和脉络，使问题世界化。那么，在中国的背景中，我在日本的背景中提出的历史认识问题又是怎样定位的呢？

我想起了 1999年 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时，在一个电视对话节目中，一个日本听众不耐烦地问道，日本必须一直谢罪到什么时候。对此，朱总理回答了三点，第一点，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向中国正式谢罪。第二点，我们没有要求日本谢罪。第三点，谢不

谢罪是日本自身的问题。对于第一点今天不做涉及。第二点和第三点，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包含其中。有报道称，这个回答是考虑到了政治上的影响。如果暂不考虑这个因素而直白读解的话，有一种理解就是日本必须谢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中国不想争论谢不谢罪的问题。只是看日本如何付诸行动。所谓“日本自身的问题”对日本来说也许是现在时态，但对中国来说却不一定是现在时态。也就是说，从政策重点来看，这并不是中国当前的紧要课题。

在中国，谢罪问题从根本上说原本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从抵抗日本侵略，到最终赢得解放的现代史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所以谢罪问题不可能成为历史认识问题。只有当他们认为日本人是否谢罪关系到日本人是否承认侵略的历史时，谢罪问题才会成为历史认识问题。但是，这也只是作为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而不直接成为相互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历史学者就历史认识问题共同讨论时，即使会议成功了，其实也只是中国学者进入了日本的特殊背景中，或者是双方根本是在没有意识到背景不同的情况下而进行共同讨论的。总之，这样的共同研究即使有“共同的认识”，也没有形成认识上的“共同的空间”（以下“背景”也称为“空间”）。“共同的空间”必须是某一背景（空间）里的文化主体和在另一个背景（空间）里的另一个文化主体之间经过摩擦和冲突，或是寻求一个扬弃摩擦和冲突的空间，使基于主体间的对话得以成立。

如果我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营造的知的“共同”是以“共同的空间”为目标，那么就务必架起一座桥梁，使视农业问题为重要课题的中国的“空间”和视历史认识问题为重要课题的日本的“空间”之间的对话得以成立。

二

就“空间”这个问题，我向中国和韩国朋友们介绍日本的一个“战争记忆的空间”。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家乡的一个公园里，一位安着一只义足的老人突然和我搭话。老人说，为了悼念在塞班岛^①“玉碎”（全军覆没的美化语）的战友，他坚持每周日早上步行近两个小时来参拜护国神社^②。老人之所以与我交谈或许是出于对我那坐在轮椅上，患有帕金森氏病的弟弟及陪伴在旁的年过九旬老母的同情。他好像找到了共同语言似的，突兀地对我说，“我是塞班岛的幸存者”。通过“幸存者”这个词，我感味到，老人对于战争的全部记忆恐怕就是塞班岛全军覆没的受害体验。而老人将“塞班岛”视为共同语言，或许是因为他觉得，他在塞班岛上的体验是与从岛上升空的美军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实行大规模轰炸所造成的全体国民的受害记忆相通的。作为那个记忆中的“痛苦共有”者，他一定是想对我病残的弟弟和年迈的老母说些什么。比如，对身处痛苦中的他们的鼓励等等。一个过路者的他对我家表现出来的唐突的热情，暗示着他战中及战后的体验实质。恐怕他对于护国神社的执著和对我们表现出的热情深处，包含着关于全军覆

① 南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岛屿。1944年 6月，在登陆美军的攻势下，~~1944年~~日军守备队全军覆没。~~1944年~~人的民间非战斗人员、居民也全部死亡。同年 7月，美军以此为基地，开始用远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

② 1927年（明治十二年），在全国各地的招魂社中，东京招魂社被改名为靖国神社而被特殊化。1949年（昭和十四年），地方上的 1400个招魂社改称护国神社。护国神社虽不像靖国神社那样成为政治话题，但它们作为地方上祭奠战争牺牲者的场所，已经固定于民间日常生活情感中。在思考战争责任问题时，也可将它与靖国神社相提并论。

没战的历史体验的意义本质。

像这样的又一个又一个战争中感情记忆的积累，就是使日本的历史认识产生流动的“空间”。在这里，共有的感情指的是日本人与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的美军战斗，最后战败从而产生的“奋斗和受害”这两种极端的情感。奋斗指“玉碎”，被害指广岛，二者虽然被两极化了，但二者之间并没有间断，从奋斗到被害，二者相连形成了一个国民感情的“空间”。

生成历史认识的“空间”，不是意图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空间”，也不是过去已盖棺论定的历史的“空间”，而是流动着平凡而又生动的感情的现在日常生活的“空间”。战后的左翼就是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展开反核和反战和平运动的。另一方面，日本主义者和保守政治家及历史修正主义者，也巧妙地利用这种流动的生活情感和时而产生的共感作用来构筑自己的意识形态。

战争记忆在作为痛苦和悲惨记忆的同时，与忍受了痛苦和悲惨并从中挺过来了的奋斗的记忆结合在一起时，它虽与反战和平和只是一纸之隔，但却趋向美化战争。小泉首相关于日本战后的繁荣受惠于战死者的发言，和小林善纪“你能为公而死吗？”的叫嚷，都发自这个危险的“空间”。

但是奇怪的是，加害的记忆，例如侵略中国的记忆却没有从正面进入这个“空间”。侵略中国的“加害的记忆”仅仅在出征中国大陆的士兵及其家属间私下共有着，而大多数国民对这种加害的记忆并没有实际的体验，只不过是一种传闻知识罢了。所以让中国人气愤的是，大多数日本人的加害和谢罪意识没有达到上述奋斗和受害感情那样的深度和广度。在国民感情的共有“空间”里，关于日美战争的记忆是占压倒性的，这才是日本的“战争记忆的空间”。

在日本，“战争记忆的空间”和“加害记忆的空间”是如何

相连，又是如何不相连的呢？^①

有一点可以确切地说，西尾倭二写的《国民的历史》仅以“战争记忆的空间”为依据，创作了与欧美孤独奋战的日本近代史。而反对他的历史学家则一味以中日战争等“加害记忆的空间”为依据。由于两者间的对立是身处不同“空间”的对立，因此不具备争论的前提。这两个不同的“空间”情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被害与加害的单纯的二元对立。其中还隐约可见崇拜欧美或对抗欧美，以及蔑视亚洲等明治以来的国民感情的结构。这就暗示了如果历史认识问题自始至终只是单纯地探求日本“加害”与“受害”的事实，就无法深入到真正的历史深层。

真正必要的是，我们应该对导致历史认识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分裂的这两个“空间”之间的落差进行历史的洞察。

例如，发生在中国的东史郎现象^②就是从上述落差中喷发出来的中国民众的愤怒和不满。

但是当我们讨论这个落差时，另一方面不要忘记正确评价日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的活动。他们在日本作为少数派，为了将“日本人作为加害者必须谢罪”的认识推向全国，进行着艰难的奋斗。但是，能够对此做出评价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受害国的国民。“知的共同体”这远年来摸索到的一条线索就是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至少就中国社会或者知识界而言，除了少数的例子以外，日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进行的活动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关心

① 作为参考，从我自身来看，我虽然没有加害的真实体验，但奋斗、被害和加害三者对于我个人而言，在感情上是浑然一体的。这是出于我对歧视的愤怒。不论横亘在欧美与亚洲之间的歧视，还是日本人对亚洲的歧视，我都怀有愤怒。也正是这种愤怒把奋斗、被害和加害贯穿起来。这也许启示我们有必要以某种媒介将三者联系起来。

② 请参照孙歌《作为思想的“东史郎现象”》，《论亚洲的两难境地》，岩波书店，~~1999~~

没有直接的关联。遗憾的是，日本知识分子立论的方法和论争的焦点与日本的脉络结合得越紧密，在外界看来就越显得内向。例如日本国内知识分子对东史郎事件的复杂对应就是一例。虽然对于两国之间的龃龉，中国知识界也有相应的责任和原因，但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我们日本人不能满足于没有与对方联系起来的这种片面的“良心活动”。

实际上，日本人本身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日本的媒介不论是反战还是厌战，总之在制作反对战争节目或编辑相关专题时，可以说怨~~因~~象以上是从战争受害者角度出发的。即使偶尔出现加害场景，也几乎没有残酷的画面。出征并实行了加害行为的现在已~~残~~骸岁以上的老人大多沉默着。媒介上的战争专题片就像经过无形的审查一样，几乎都是受害的画面和报道。这是日本人的“战争记忆的空间”最令韩国人和中国人不满之处。这是由于日本人“内向自我”^①的封闭性所导致的？或者，不是源于这种情感层次上的原因，而归根结底是历史认识上的偏差或者是历史观的歪曲？或者是因为日本同时进行着日中战争、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四个在性质上有着微妙不同的战争，从而造成了战争的复杂性？抑或是起因于作为战争基础的东亚近代过程的复杂局面？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也不甚分明的“战争记忆的空间”和“加害记忆的空间”的相连和不相连的关系，如何才能将它呈现给亚洲的知识分子，使它成为问题呢？当历史修正主义者片面地立足于“战争记忆的空间”来推广他们带有偏向性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时，如何历史地明辨两个“空

① 加藤典洋：《论战败后》，讲谈社，~~灵苑~~ 苑 作者认为，在战后日本分裂成革新派的“外向型的自我”和保守派的“内向型自我”。前者是以外来的具有普遍性的民主主义和人权为依据；后者则立足于祖国、天皇等传统价值之上。

间”之间的关系和形态——它们导致了日本人在历史认识上的复杂性和分裂——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认识问题。

三

为使论点更加明确，我们有必要先确立一个前提，那就是历史学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例如，历史学家怎样看待日中战争的历史，具体地说，就是如何承担对中国无辜民众实行侵略和加害行为的责任。

一般说来，在谈及对战争中的暴虐行为负责时，追究加害者的暴虐行为、向受害者谢罪、进行补偿和防止再犯等责任行为，全部应当由当事者和相关者（高桥哲哉所说的“日本人”）来承担，也就是说，应该从政治上将它作为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由国家或政府来承担^①。因此，这个政治责任应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而不仅限于历史学家。

但是在现实中，就拿南京大屠杀来说，历史修正主义者们设置了中日双方在历史事实认识上的不同这样的舞台，利用它将责任问题偷换成历史认识问题，以回避政治上的责任。事实上，历史修正主义者巧妙地分别使用了两条战线：一条是隐瞒政治目的，把问题作为历史事实的问题并对事实进行操作，借以引起在“认识”上的争论，成功的话能使事实趋于暧昧，即使不成功也可以以“未定论”而束之高阁；另一条战线是把政治意识形态置换为历史观、历史认识问题，以“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中民众的受害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要单单责备日本”等主张来回避战争责任。

^① 高桥哲哉：《战后责任再考》，《论战后责任》，讲谈社，灵泉社 作者定义道：“从属于日本国家这一由法定义的‘政治’共同体的‘日本人’”，第 295 页。

因此，许多有良知的历史研究者都积极地参加与他们的斗争，历史研究者们作为“记录的责任”者和“记忆的责任”者把殖民地统治和战争责任的问题承担起来。而且，历史修正主义者还以“在记录事实时的可靠性”为借口，把政治问题偷换成历史认识问题，仿佛历史认识问题才是问题的核心，面对这种现状，历史研究者们另一个责任就是剖析被置换了的问题，并将其阴谋公诸于世。记录的责任、对事实的探究等也只有在这种剖析的前提下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相反，如果幻想通过正确叙述“事实”来瓦解他们的政治意图，即不对历史修正主义者“偷换概念的阴谋”进行揭露而仅仅通过具体考证来与他们对抗，这恐怕就中了他们的圈套。

进行历史研究应该以“客观事实”为材料，这一学术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麻烦的是历史修正主义者也以这个原则的信奉者自居来阐述历史。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意图对材料进行选择、重组和篡改。对他们来说，历史研究的原则只不过是他们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为了批判他们，有良心的历史研究者是不是同样地应该将历史事实——即使这种历史事实是经过客观地缜密考证的事实——纳入自己的批判构架中呢？这样的对抗是政治斗争呢，还是学术上的斗争呢？

遗憾的是，这不能说是学术上的斗争。这是因为，历史修正主义者虽然标榜学术的原则，实际上有时却是非学术性的。另一方面，从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学层面来看，与他们对抗的良心派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是要批判意在查明日本侵略性的研究本身，我只是想说，意在查明日本侵略性的历史研究自身被目的化时，它势必成为从属于被抽象化了的政治目的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自身的流动性以及政治主体根据对象和状况的不同而采取的临机应变等都将忽视，由此而产生无论状况如何变化，前提和结论都